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

全球化与地域性：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GLOBALIZATION AND TERRITORIALITY:

STATE AND SOCIETY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唐士其／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SERIES OF WORLD POLITICS

全球化与地域性：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GLOBALIZATION AND TERRITORIALITY:

STATE AND SOCIETY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唐士其／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SERIES OF WORLD POLITIC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地域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唐士其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
(世界政治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3690-4

I. 全… II. 唐… III. 国家-关系-社会-研究 IV. D03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5092 号

书 名: 全球化与地域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著作责任者: 唐士其 著

责任编辑: 耿协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690-4/D·203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8.75 印张 414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前言

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员。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一系列过程的终结和另一系列过程的开始。它既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又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对世界经济采取封闭态度,那么经济全球化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意义,而且甚至变得不可能。中国对 WTO 的加入意味着中国已经决心完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且准备在充分利用这一进程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机遇的同时,应对它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各种挑战;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接受世界上这一最大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规则的同时,决心通过自己的理念与行动,改变和完善这些规则本身,进而推动建立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 20 世纪末以来每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都必须面对的

一个重要现象、一种考验和挑战,无论这个国家是否加入 WTO 或者其他全球性的经济联系网络。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过程、制度过程和文化过程。它体现为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合作与竞争,体现为各地域国家发生的制度调整与演变,也体现为人们对这一过程背后的动力机制、它所包含的权力关系以及它的未来走向的主观判断——其中既包括各强势集团对其进行的正当化和合法化,也包括那些弱势或者被边缘化的群体对其进行的抵制与批判,而观念的过程与实际的物质过程之间又体现为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换言之,经济全球化改变着我们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又将影响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因此,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决定着各相关国家对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应对方式,同时也将决定这一进程本身。

正因为如此,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整个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热烈讨论的话题,而且由于这种讨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本身也已经被“全球化”了。与此同时,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各种学术研究也已经遍及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不仅成为不同领域学者共同的研究对象,而且也成为学者们对自身研究对象进行反思的一个新的参照点,因而有人甚至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全球化”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已经替代了“现代化”,成为一种新的“范式”。^①

但另一方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全球化”的讨论中也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不平衡,德国学者普林茨(Alois Prinz)等指出了这一点:“引人注意的是,市场上几乎所有关于全球化的书籍都不是经济学家写作的,而是这个专业以外的人,新闻记者、工程师、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物理学家撰写的。”^②这种说法不无夸张之处,但也反映了某个方面的事实,即在那些足以淹没任何一位研究者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文字中,绝大多数并不出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之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虽然对经济全球化已

^① 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到 70 年代之后逐渐走向衰落。在这之间二十多年的时间内,“现代化”成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② [德]阿洛伊斯·普林茨、汉诺·贝克:《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德〕乌尔利希·贝克等著,张世鹏等编译:《全球政治与全球治理》,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1 页。

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之间明显的矛盾与冲突却又足以说明,人们对经济全球化这一现象的认识和理解还存在着严重的差异,同时也说明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系统和深入。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研究者采取一种批判和超越的态度,把对经济全球化的科学研究与出于意识形态或者利益得失考虑的关于这一现象的各种观念与言论区分开来。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科克斯(Robert W. Cox)所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关键性的结构转变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尤其需要批判性的理论,它能让我们关注全局性的问题。”^①

本书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地域国家公共生活的进程受到的影响以及各国对这一进程的应对方式的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反映了作为机构实体的国家与各种社会组织及个人的关系,还体现为不同的社会联系与组织方式,具体说就是强制与自由、等级与平等、秩序与离散等等相互对立的社会联系方式之间的关系,当然,也体现了共同体内部人们对这些关系的理解,换言之也就是某一共同体对于公共生活、对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的理解。^②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不同侧面的反映,比如说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等等,而自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或者说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伴随着近代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一种超越了血缘、地域、宗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政治的差别的人类联系方式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化。^③ 从此之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域国家内部的发展与稳定,甚至战争与和平,而这种关系的聚散离合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各地域国家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面貌。因此,本书也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国家与市场或者说

① R. W. Cox, "The Millennium Symposium", *New Political Economy*, 4 (3), November, 1999, p. 393.

② 作为组织与机构形态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作为不同的人类联系方式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传统上则是政治学关注的问题。本书作为一项从政治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将主要关注后一个方面的内容。

③ 这种超越了血缘、宗教、地域乃至政治差别的人类联系方式的产生,被包括亚当·斯密、亚当·福格森在内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视为人类“文明化”的重要标志。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面。

经济全球化就其物质性的形式而言,表现为一种全球性经济联系的产生,一种商品、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但是,在这种物质现象的背后,掩蔽着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内容。简言之,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社会、政治与法律制度变迁的结果,也可以反过来说,经济全球化以世界各国、至少是各主要国家相应的制度变迁为前提。比如说,如果世界大多数国家仍然保持一种封闭的政治体制、国家对社会经济的高度控制,那么经济全球化就是一件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由于20世纪末开始的这一次经济全球化既是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是西方国家有意识地推动的产物,所以它自然也就伴随着各地域国家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系列主动和被动的调整过程。

因此,经济全球化更应该被视为一个经济与政治的综合现象,它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与管理体制,同时也在对各国的政治结构与政治生活发生着全面的影响,并且在重新塑造着各地域共同体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于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而新自由主义最基本的立场就表现在相信自己已经为整个人类提供了一种普适性的发展道路,即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化,因此,经济全球化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强迫性的自由化过程。但这只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步,这一步使经济全球化这种现象成为可能。但在此之后,甚至与此同时就会出现经济全球化的第二步,即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新自由主义性质的反抗以及这些国家在一种开放的全球性经济联系中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从而又将导致这些地域性共同体内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调整与变动。这种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矛盾有可能导致各地域共同体内部的社会冲突,也可能导致这些地域共同体内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裂痕以及两者之间的张力,因为接受了经济全球化(比如说决定加入WTO)的国家将根据全球化的逻辑对自身的社会经济进行相应改造,而在这个过程中,它又不可能回避本共同体社会内部的逻辑对其结构与行为的约束和规范作用。

为了说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这种矛盾与张力,本书进而采取了一

个特殊的维度,即地域性与超地域性的矛盾关系的维度,以凸显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虽然在现有的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关于地域性与超地域性关系的讨论,但就作者所了解的情况而言,目前还没有集中探讨这个问题的学术成果。就此而言,也可以认为本书提供了一种新的尝试。作者认为,地域性与超地域性是至今为止人类生活与交往活动的两个基本方面。简单来说,地域性指的是人类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聚群而居、并在此范围内形成各种相应的社会联系与社会组织的特性;超地域性指的则是人类突破其联系与交往的地域性限制,并且在更广大的空间内形成新的社会联系与社会组织的特性。

由上述简单的定义可知,地域性与超地域性的区别只是相对的,它们之间有可能相互转化。另外,地域性因素与超地域性因素的区别也并非两种不同的人类活动的区别,因为任何一种人类的行为与组织,比如说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会同时表现出地域性与超地域性两个方面。但是,各种人类行为与组织的地域性倾向与非地域性倾向是不平衡的。政治活动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倾向,而经济因素在某些条件下则可能表现出较强的超地域性倾向。地域性是历史进程的产物,是历史积淀的体现。地域性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就是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地域性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的基础则是共同体成员之间共享的一种关于分配正义的观念,以及支撑这种观念的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地域性共同体的最高体现就是地域国家,而国家之所以能够以强制力为后盾展开各种政治过程,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家行为即使代表了某个或者某些特殊的社会阶级或者集团的利益,但与此同时也反映了共同体特有的分配正义观念。

由于人类生活与活动的地域性特征,他们形成的各种共同体中,地域性共同体具有最久远的历史和最密切的内部联系。古希腊政治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把家庭、村落与城邦视为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几个自然阶段,这种观点一直为欧洲诸多政治思想家所继承,而这些共同体的一个基本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的地域性,或者说它们都是具有其特定的地域基础的共同体。当然,随着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也会

产生一些超地域性的联系,甚至会产生某些超地域性的共同体,但至今,人类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任何一种比地域性共同体、特别是地域国家更稳定、更持久的超地域性共同体。

当然,地域性共同体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并不意味着它们是被给定的、其规模也是不能变化的。实际上,技术进步与经济交往作为超地域性的因素,推动着人类相互联系的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也在扩大着地域性共同体本身的规模。但是,单纯出于利益与兴趣的相互联系与交往还不等于人类共同体的产生。如前所述,共同体的基本标志是其成员内部一种关于分配正义的观念的出现,因而必须是他们之间的相互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这种关于分配正义的观念构成了地域国家的基础,同时又被地域国家的活动所强化,因而同样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并且因此而决定了某个特定的地域共同体内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

经济全球化不言而喻自然是人类交往与活动中超地域性因素发展的典型体现,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同步地改变人类共同生活中其他因素,比如说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地域性特征,尤其是并没有带来一种能够为各地域共同体一致认可的分配正义观念,所以这一进程与各共同体的公共生活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与冲突,同时也将带来各地域共同体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应该说,这种矛盾与冲突由于20世纪末开始的经济全球化所具有的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特征而被明显加剧了。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强势的政治经济理论与意识形态,在以大资本的力量为后盾,向全世界强行推进自由化的同时,既忽视了人类公共生活的地域性特征,又忽视了人类公共生活的地域性差异,从而不仅必将导致非西方社会以各种形式的地域化或者再地域化表现出来的反弹,而且由于其有可能破坏各共同体内部地域性与超地域性因素之间的平衡而引发这些社会的危机。

因此,从地域性与超地域性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地域共同体内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将围绕以下两个方面的矛盾展开。一方面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倾向于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与服务,另一方面公共生活的地域性又要求国家对社会提供地域性的管理与服务;一方面要求削弱国家的权力和缩小国家的规模,另一

方面又要求强化国家的能力与国家的管理水平以解决地域性的社会政治问题。能否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要求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就成为各国能否成功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及经济全球化本身能否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本书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国民国家这一人类共同生活与活动的地域特征的最高体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不仅不像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已经过时,而且应该承担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在协调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创造性的作用。因此,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地域国家各方面的职能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探讨。另一方面,人类公共生活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决定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个国家由于自身状况及相对位置的不同,它们的得与失会各不相同(对于不同的个人来说情况也完全一样),同时它们所采取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形式也会、而且应该各不相同。

就此而言,经济全球化能否健康发展,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利益,同时避免这一过程的消极影响,就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各国是否能够消除新自由主义的消极影响,并且提出一种立足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及其理论基础;第二,是否能够形成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为各国、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从研究方法上说,本书采用的是一种历史性与全局性的方法,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宏观的指导思想贯穿了本书的始终。同时,历史性与全局性本身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可以说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的考虑本身就是历史性与全局性研究的成功的典型,他们的成果构成了本书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具体来说,历史性指的是作者试图把经济全球化过程纳入一个更长的人类历史进程进行理解,以期能够发现它在整个人类历史演进中所体现出来的连续性与间断性,从而对这一现象本身、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影响作出尽可能确切的判断。为此,比较历史的方法是本书主要的方法之一。作者主要依靠对人类历史上两次经济全球化的比较,以及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变化的比较,力图揭示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结论。全局性指的则

是作者试图从尽可能广阔的视角出发,既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含义,又考虑到经济全球化不同的参加者所处的具体位置使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的不同影响以及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模式,从而尽可能完整地揭示经济全球化所包含的各个不同的侧面。之所以采用这样一种方法,是因为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的进程,不仅在经济与政治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层,而且各地域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的得与失、其面临的问题也都表现出严重的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用全局性的视野,才能多多少少展示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全貌。

就此而言,虽然作者希望找到一种超越性的、批判性的立场,或者说正是因为作者力图从一种超越性的、批判性的立场出发,所以反而必须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这样的问题上,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完全客观中立的判断标准,也没有可能发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应对模式。然而对自身的立足点及其局限性的自觉意识本身就是超越性和批判性的体现。因此,本书并不是从某些抽象的原则或者立场出发对经济全球化进行的一般性考察,而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即中国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并且根据这些国家共同的利益与要求,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的一种探究。换言之,“中国视角”是本书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立足点。这种“中国视角”不仅表现在作者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以及未来的调整方向,而且甚至更主要地表现在这是作者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方面的问题进行判断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另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说文化、宗教、乃至家庭等等,但是,出于研究主题的考虑以及经济全球化这一现象的特点,本书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经济领域,或者说主要研究的是从经济角度来观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当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文化的全球化也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并且同样将对各地域共同体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但作者希望能够把它作为以后进一步研究的内容。这也是事先需要加以解释的。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地域问题	/ 1
一、人类生活中的地域因素	/ 1
二、作为地域性政治组织的国家	/ 14
三、地域视野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20
第二章 商品经济的第一次全球化及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	/ 30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及其前史	/ 30
二、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	/ 50
三、20 世纪主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	/ 64
第三章 20 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	/ 94
一、20 世纪末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 94
二、20 世纪末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和制度基础	/ 112
三、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	/ 124
第四章 20 世纪末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138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民国家政治结构与过程的影响	/ 138
二、经济全球化与“民主赤字”	/ 151
三、政治权力结构的向上和向下移动	/ 160
第五章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经济职能	/ 166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管制职能	/ 166
二、国家的经济战略与经济安全以及国民经济体系的问题	/ 196
三、国际经济合作与贸易政策	/ 224

第六章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的社会职能	/ 247
一、国家社会职能的基础	/ 247
二、社会公正及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挑战	/ 257
三、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的社会职能及其调整	/ 283
第七章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国际社会	/ 312
一、经济全球化时代国民国家的社会基础	/ 312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 327
三、“全球治理”——国民国家与国际社会	/ 342
第八章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关系	/ 364
一、全球化与地域性	/ 364
二、历史和文化视野中的国家与社会	/ 386
三、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探索	/ 412
参考文献	/ 435
后 记	/ 447

第一章

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地域问题

一、人类生活中的地域因素

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人类的政治生活有其独到的理解,她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类在某个地域共同体中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才是政治的本质。阿伦特曾经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地域性特征进行过如下总结:“栖居于大地之上,这是人类状况的最本质之处。就我们所知,在宇宙中唯有地球上的自然界能够为人类提供一个栖居之所,并且使他们无需付出任何特别的努力就能够自由地移动与呼吸。”^①

对大地的崇拜是所有原始民族共有的一项最重要的宗教内容。这种崇拜不仅因为大地为每一

^①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 2.

个人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而且也因为大地为他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全部资源。然而,对原始人来说,他们的观念中的“大地”并非整个地球,实际上只是他们所居住的那一片大小不等的地区,即具有不同的自然地理景观与自然禀赋的、同时具有相对明晰的如山川河流一类的自然边界的地域。他们在这些大小不等、风景、气候与资源条件各异的土地上生活与繁衍,代代相传,形成了一个人类共同体。作为其结果,这些共同体不仅具有各不相同的与它们各自的“大地母亲”的联系方式,对她的类似而又各不相同的情感,而且也形成了共同体成员之间不同的相互交往与联系的方式。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不同的人类共同体相互独立、彼此区别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不仅在客观上,而且由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反思性从而在主观上把不同的人群区别开来。因此,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文化的差别同时就表现为一种地域的差别;而人类的任何个体都必须在某个特定的地域性群体中生存这一点,则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这就是人类生活中的地域性因素,像民族性、文化等等是其最基本的方面。在本书中,我们把长期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生活,并且其成员之间具有相应地域性认同以及对群体的认同的这种地域性群体称为地域共同体。

人类之所以必须以地域性群体的方式生存,一个客观的原因,是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所能够拥有的、以交通与通讯手段为核心的交往技术所必然具有的客观的界限。这种界限决定着不同时代人们相互之间交往成本的可接受性的边界。由于这一边界决定了人类交往所及的地域范围,因而人们没有可能在这个范围之外建立任何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联系,更不可能形成任何意义上的真实的社会集团。另一方面,由于社会集团中不同成员对某一特定时代提供的交往手段加以利用的可能性各不相同,而能够充分利用这些交往手段的个体在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只是少数,同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交往成本都会随空间距离的增加而提高(可能互联网是一个例外,但它并不构成人类交往方式的全部),所以当一定数目的人们在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之后,他们与其他社会集团及其成员之间的交往密度从总体上看就会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而不断下降。

根据这种边界,研究者可以描绘出一系列的同心圆,并以此反映不

同历史时代以每一个个体或者每一个共同体为中心的、与其他个体或者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密度。可以想象,这种交往密度从中心向边缘会不断降低。当然,这种客观的、由技术决定的交往成本的边界,只是决定人类相互联系的实际状况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人们对其相互联系的主观认知本身,也决定着一个共同体在地理意义上可能的规模。也就是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地域共同体的形成,不仅取决于人们所掌握的交通与通讯手段所提供的可能性,同时还取决于他们相互之间彼此认同的程度。

这里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地域共同体”,指的是那些能够在较长时期内稳定存在,而且其成员对该共同体以及对其他成员具有一种明确的认同与彼此认同的共同体,比如说一个家庭、一个部落、一个城邦或者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能够满足上述客观与主观条件的共同体,都要求其成员必须具有某些最低限度的共同分享的价值观,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共同体成员之间必须存在一种彼此之间默认的或者明示的承诺,即每一位成员都愿意在必要的情况下,为共同体及其他成员的某些方面的利益做出一定限度的自我牺牲。这就意味着,在这样的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分配正义的观念^①,而共同体则能够据此以不同的形式对其成员所占有的资源,比如说财富、权力、地位与名誉等等合法地行使一种再分配的职能。据此,我们也可以把一个真正意义上地域共同体定义为能够在其成员之间行使一些基本的再分配职能的共同体。^②这也正是亚里士多德把城邦与正义联系在一起的根本原因。^③在这种共同的分配正义观念的基础上,“所有成员都对于其他成员实现其价值追求的努力持积极的和支持的态度,至少不会妨碍或者破坏这些价值的实现。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共同体利益’,可以期望这些利益能够

① 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指的是一个共同体内部对基本的社会资源进行分配的时候所依据的具有某种正当性的标准。

② 从以后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这个定义对于理解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③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的感觉;家庭和城邦乃是这类生物的结合体。”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整合进共同体所有成员所接受并为其利益服务的各种习俗、规则和模式中并得到其保护。”^①分配正义观念的存在意味着人类不仅是一种地域性的动物,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强调“人是城邦的动物”的用意所在。^②

人类社会生活与交往活动中地域性因素作用的结果体现为各种制度的产生,而这些制度不仅规范了某个地域范围内的人们行为,同时也规范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同时,这些制度的产生往往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特征,也就是说,它们对于起点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即使是由于历史上非常偶然的原因形成的一些制度与规则,都可能对该共同体后来的制度选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当然,制度的路径依赖的结果,又会进一步强化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域性特征。

总结以上的论述可以认为,由于历史上不同时代人们所拥有的交通与通讯手段的限制,人类只能以地域性群体的方式生存;同时由于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域共同体的产生都必须以其成员之间的主观认同达到一定强度为前提,而后的形成与发展又必须建立在成员之间密切的物质与精神交往的基础之上,所以实际上形成的地域性人类群体的规模通常应该小于技术意义上他们可能的交往范围。另外,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内部其行为方式与交往方式中路径依赖现象的存在,也会使那些已经形成的联系方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而进一步使人类群体及个体之间实际交往的密度小于技术提供的可能,否则就无法理解比如说属于同一文化的古代希腊人为什么在彼此频繁交往的同时,又无条件地忠实于他们自己的城邦,甚至把城邦视为自然形成的最高的、最广泛的人类共

① Jan Narveson, "The Obsolescence of the State: New Support of Old Doubts", in Yeager Hudson (ed.), *Globalism and the Obsolescence of the State*, Lewiston-Queenstone-Lampeter: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7, pp. 4—5.

② 亚里士多德说:“人类自然是趋向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另外的一种译法是“城邦显然是自然的产物,人天生是一种政治的动物”。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